

## 優秀的中國人民

中國具有五千年優久的歷史，遠在二、三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立論已成傳世經典，又在西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科技保持鼎盛，乃西方各國所望塵莫及，所以在十一世紀初，中國的經濟水平普遍高於歐美，總體經濟或國內生產總值，從西元元年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都雄居全球榜首，軍事上蒙古軍三次西征，遠至敘利亞、埃及、伊拉克，是以無論就文化、科技、經濟或軍事而言，中國都曾極度輝煌，傲視全球。

但是中國人的素質不好和“醜陋的中國人”，居然是近年來為世人所一致認同，並已根深柢固的觀念。個人認為這個觀念打擊了國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發展出崇洋媚外的心理，這會是中國未來進步，並更上一層樓的絆腳石。的確，一般中國人是有難以勝數的陋習惡行，但這一切都是由於經濟水平極度低落，沒有接受教育所導致及引伸的必然表象，和人種的優劣完全沒有關聯。

因而，筆者特意搜集與分析了客觀、具體並精確的數據，充分的證明中華民族的華人是世界上“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這雖係個人的一得之見，但應該是值得所有華人振奮的創見，就此不憚野人獻曝，撰寫本文來和國人分享。

更重要的是，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主要是靠製造業之代客加工，以人民的血汗和環境污染換取蠅頭小利，說白了是中國的工廠和企業，替外國企業打工，自個兒啃骨頭而肥肉留給外企，不過這也是中國經濟要迎頭趕上必經之途。但是，今天中國已具備一切條件能夠快速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其是在企業和政府配合下通過併購之手段，而迅速促使企業升級，更迎頭超越歐美。中國人民、企業家和政府都要有信心，這絕對是齊心協力、上下共同努力可以達到的。

## 前 言

滿清後葉，列強諸國以船堅炮利不斷地凌辱中國，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列強塗毒中國之後，更要求割地賠款。再加上一窮二白，具體數據顯示，在民初 1913 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 1990 年之國際元 IGK\$552，只是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5,301 的十分之一，僅略勝於尼泊爾，位居全世界二百餘國家之倒數第二（參考一）。是以，曾經留美多年，還是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都認為，中國這個民族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知識、文學、音樂、藝術、連身體都不如人”（參考二）。也無怪乎不少國人也跟著認同，並會不自覺的自認為較之歐美人種矮了一截，甚至還不如日本。

然而現代的心理學認為，自信心就像能力的催化劑一樣，它可以將人的一切潛能都調動起來，將各部分的功能推進到最佳狀態。所以說，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或關鍵，它幾乎是所有教育家與企業界都強調要極端重視的，沒有必要，甚至是無知的自我矮化，只是中國崛起與進步的絆腳石，身為中國人，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必須要徹底地摧毀這種根深柢固，但又是絕對錯誤的觀念。

政治、道德、知識、文學、音樂和藝術都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優劣的評價又是見仁見智，這可都是文人墨客發揮辯才的好題目。但筆者著重的是事實與真理，更無意重炒舊飯的再掀起一場中西文化論戰，是以，這幾項全都略過不談。

但是生活在今天以西方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為主流觀點的世界上，財富及經濟水平已經成為衡量個人或族群能力的標準。再者，歸根究底，一窮二白到底還是罪魁禍首，所以必須針對它做深入的探討。

## 世界經濟史

聯合國為了要送舊迎新，特別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本世紀初，出版了當代最傑出的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博士，所撰寫的“世界經濟千年史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參考三）。這本書是該作者近半個世紀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它收集並列述了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從十一世紀到廿世紀的經濟演進，同時更客觀的將各國歷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採用可以互換共通的 1990 年之國際元（Gear ¥ - Khamis Dollar - IGK\$）為單位，換算成當年當地的購買力總值，加上各國歷年的人口，而計算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並節錄出“世界經濟歷史統計表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這份統計表趨年更新，最新的一份包括有 2008 年之數據（參考一）。

這本書和統計表陳列了大量客觀而具體的數據和匿藏了許多寶貴的資訊，非常值得全世界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仔細研究與發掘，筆者僅就和本文直接有關的數據探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西元元年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的近兩千年間，除了在十八世紀曾短期的被印度的蒙兀兒（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稍微超出外，中國的總體經濟或國內生產總值，一直雄居全球榜首，（注：資料表上西元元年和十一世紀初，印度各邦的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曾超過中國；但當年中國已經是統一的國家，而印度各邦一直到十七世紀末葉才被蒙兀兒帝國征服而統一。）直到 1890 年才被旭日東昇、新興的美國所超越。又在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國際元 \$275 億，當年整個西歐卅國加上美國的總國內生產總值也只有 \$117 億，僅及中國之四成。同時中國的經濟水平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 \$466，較之以義大利為首的西歐十二國的平均值 \$425，或義大利的 \$450，以及美國的 \$400 都要高。這兩組重要的數據，可能是曾經研究和考証過紅學的胡適先生所忽略，否則身為中國人，一定會為他對中國民族的評語而汗顏。

注：中國之富庶是源之於科技，在西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一直保持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請參考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 Joseph Needhan 撰寫之“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參考四）

中國經濟的確曾經在歷史上輝煌過，但這只能做為參考，並不足以自我陶醉，我們更需要分析探討的是，目前以及近期的經濟水平與發展。

## 香港和新加坡

我們先看一下客觀的數據，根據“千年史”中最新的統計表：在 2008 年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國際元 \$31,704；新加坡是 \$28,107，在全世界二百餘國家中，他們分別雄居第一名和第四名（美國從 1913 年正式超越英國和紐西蘭而為全球之首後，一直保持到 2008 年才退居第二為 \$31,178 和挪威第三是 \$28,500）。不但如此，更驚人及有說服力的是兩地在近年來經濟水平提升的速度，更是遠勝於歐美，為了做最好和最公正的論證，以避免水平愈低便愈易提升之論的干擾，筆者特意選擇了 1994 年（乃香港和新加坡之人均生產值都超過西歐各國的一年）為起點，從 1994 到 2008 年，香港的經濟水平提升了 53% - 相當於年增

長率 3.07%，由人均生產值 \$20,770 提升到 \$31,704；新加坡則進步了 56% - 相當於 3.27% 的年增長率，由 \$18,005 提升到 \$28,107；同期美國只進步了 28% - 相當於 1.80% 的年增長率，由 \$24,279 提升到 \$31,178；與此同時，整個西歐十二國的經濟水平也提升了 28% - 相當於年增長率 1.76%，由 \$17,428 提升到 \$22,246；挪威則提升了 36%。

香港或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都是美國的 200 倍以上；和西歐人口密度最高的荷蘭和比利時比較，也都是相差近 20 倍，自然資源更是相對的極為貧瘠，在此萬分不利的自然條件下，又是從原本相當低的經濟水平，站在幾乎同等的起點，而能夠促使它的經濟水平增長率，達到歐美各國的幾乎兩倍，並在絕對值上分別雄居全世界第一名和第四名。這豈不是充分的證明，純粹以經濟水平為衡量族群能力的標準，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民本質和能力是遠高於歐美的？

香港原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人口的組成也是 95% 華人；英國和歐美裔總共則遠低於 1%。新加坡的人口的組成是 77% 華人、14% 馬來人、8% 印度人；歐美裔總共也不過是 1%。這豈不是又充分的證明，中華民族的華人是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

筆者由衷的敬佩兩地的人民，完全是他們自己的打拼，才取得如此傲然的成就，成了全體華人的光榮與典範。不過必須要指出，這批華人的先祖，幾乎都是因為家鄉貧瘠，在本鄉本土無法改善生活的勞動人民，才離鄉背井的遠赴海外謀生的老百姓，他們絕大多數並非本質過人的上層社會的精英。（在此，筆者特別聲明，這裡的分析單純是就事論事，並沒有褒貶的意思。）明乎此，就知道他們的傑出成就全部都可歸諸於先天本質和後天薰陶二者合一的必然結果，這一點確是無庸置疑的。

## 寶島臺灣

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另外一個華人的聚集地還有中華民國的臺灣，從 1950 到 2000 年的整整半個世紀中，臺灣的經濟水平提升了極為驚人並舉世無匹 1,742% - 相當於年增長率 6.00%，由人均生產值 \$916 提升到 \$16,872，猶勝於全球第二名南韓的 1,583%；而遠遠超過第三名日本的 980% 及第四名香港的 952%；或新加坡的 915%；和美國的 198% 及英國的 193%，更是無從比較。（注：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因境內發現石油，而令其生產值總值同期增加 1,322%，博茨瓦納 Botswana 因鑽石礦而增加 1,072%，均不計。）

或者有人說，香港和新加坡都曾經或現在仍是大英聯邦的成員，英國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對兩地之經濟繁榮居功不小。另外也有人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水平之快速提升，是基於兩地特殊的地理位置，香港是有整個南中國為其腹地，新加坡則有整個馬來半島為其腹地，兩地得天獨厚的位居兩區的門戶，各為其腹地之吞吐港，也許是其快速進步的主因。

以上的兩個說法雖然是各有所本的論調，並不完全和事實相符，當然更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同樣是大英聯邦的成員國，大多數仍然是一窮二白，不少成員國的經濟水平在 2008 年還不及香港或新加坡的卅分之一，即使是成員國中的佼佼者，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挾其地大物博以及早已開發的優勢，早在 1950 年和留下典章制度的英國之經濟水平，已是港新兩地的三倍以上；到 2008 年卻也都遠落後於兩地，由此看來英國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對兩地之經濟繁榮實無大功可居。

再看臺灣的例子，它根本是個孤島，完全沒有腹地，尤其是在 1950 年以後，更和鄰近的中國大陸完全隔絕，不過是在 1980 年以後才開始破冰。而客觀的數據卻顯示，臺灣的經濟水平進步的速度，還遠遠超過香港或新加坡，由此看來，地理位置也不是促使經濟水平快速進步的主因。

也許有人認為，促使臺灣經濟水平快速進步的主因，可能是日本人在臺灣留下的典章制度，或者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在遷臺時所攜帶的大筆黃金。同樣地，客觀的數據也會闡明真理，觀之日本本身的經濟水平在同期只不過是提升了 980%，和臺灣的 1,742% 比較，還相差甚遠，它當然不可能是臺灣的師表，更遑論他們所留下的典章制度了。此外臺、日經濟發展模式明顯的差異，更說明兩者的關連不大，日本主要是依賴國內大型財團和企業集團的帶動；政府的扶導與支持乃至關重要。但是臺灣的模式則主要是靠著中小企業的衝鋒陷陣而起家，最好的例子可能是鴻海集團，這家公司在 1974 年成立時，資本額不過區區的新臺幣 30 萬元，所生產的也是毫無技術成分的黑白電視機之旋鈕，這是臺灣中小企業的典型，今天它竟然發展成全球 3C（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代工服務領域以及整個臺灣電子工業的龍頭。公司負責人郭台銘先生，既沒有顯赫背景，也沒高深學歷，純脆是靠百折不撓的毅力與勤奮，而白手起家變成臺灣首富。郭先生與鴻海的成功，可用他自己對鴻海成長的敘述總結，大意为“臺灣中小企業像沒有爹娘疼愛的孤兒（顯然的是沒得到多少政府的扶導與支援），爲了求生存只能練就十八般武藝，得以適應任何惡劣環境”（參考五），這也是對所有華人企業成功的點型寫照。

此外，詳細解剖臺灣經濟水平進步的歷史，會發現最初從 1950 到 1960 年的十年只提升了 48%，第二個十年是 87%，之後則是 107%，89% 及 70%，如果是大筆“黃金”的催化效果，應該是最初的十年效益最顯著。所以，根據這些客觀的數據推論，“黃金”之說也同樣是無稽之談。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回顧另外一個華人最主要聚居地的中國，自從鄧小平領導推動改革開放之後，從 1978 到 2008 年，中國的經濟水平提升了同樣驚人並舉世無匹的 588% - 相當於年增長率 6.64%，由人均生產值 \$978 提升到 \$6,725。這般的增長速度同樣也是奇蹟般偉大的成就；遠勝於全球第二名南韓的 383%，第三名臺灣的 344%，香港的 242% 或新加坡的 263%，至於如美國的 70%，日本的 81% 及英國的 85%，當然更無從比較。更有甚者，最近的八年（從 2000 到 2008），中國的經濟水平提升的速度又加速而達 8.8%，比第二名南韓的 3.96% 都相差一倍以上。是以，整個國家積蓄的外匯存底超越兩兆而位列全球之冠，整體經濟超越了日本和德國，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重要的是，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恐慌與萎縮，中國的經濟仍然以近兩位數之快速成長，帶領著全球步出了這次經濟崩潰的危機，這項驚人的成就，較之臺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顧“千年史”，從 1890 年到現在的一百廿多年，則是美國的天下，其生產值總值一直是全球之冠，它最輝煌的時候是在 1951 年，生產值總值達到全世界的 28%。然而中國在鼎盛時期的十九世紀初，生產值總值曾達到全世界的 33%，這可是美國不可能達到的境界。再以中國和現已分爲十五個國家的前蘇聯比較，雖然它在沙皇時期就開始漸露頭角，但在十九世紀之前生產值總值未曾超過全世界的 5%，這之後也從沒超過 10%，只不過在廿世紀中葉的 1935 到 1988 期間，略高於中國而已。

又總結有史以來的整體經濟能力，在過去的一千零八年的歷史長河中（由“千年史”中的第一千年以迄 2008 年），中國的總平均生產值總值爲全世界二百餘國家總和的 23%；相對於美國的 3%、蘇聯的 4%、英國的 5% 和日本的 3%，這更襯托出中國經濟力的輝煌。

（讀者可能會好奇或懷疑，到底是怎麼會及爲什麼，促使在 1890 年之前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演變成 1913 年之窮光蛋了呢？主要是基於政府限制和戰爭，筆者在“論中國經濟

崛起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參考六）的文章中已經做了詳細分析，這兒不再重複。）

## 結 論

總結而論，在全世界所有華人聚居多的地方，無論是中國、臺灣、香港或新加坡，都是人口稠密、資源貧瘠、資金與技術欠缺，客觀條件都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以西方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所著重的經濟及其水平為衡量標準，在這四個地方：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無論是整體或人均；無論是絕對值或增長率；華人的成就都是無可爭辯的全球榜首，有鑒於此，令筆者不得不推論：中華民族的華人的確是“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注：做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筆者絕不認同種族優越論或納粹之優生論，何況美國政府的人種基因研究計劃宣稱，根據染色體的排列，已經証實全球人種在遺傳學上沒有顯著差異。是以，筆者認為國人的平均智商絕不低於包括歐美在內的任何其他種，智商以外，則是受到悠久中國文化根深柢固的薰陶，而培育出吃苦耐勞的天性，因而在同等的條件下競爭，國人絕對會遠勝於一般人種的能力。）（寫完這篇文章後，才經同學好友黃大昀兄提醒，原來在 2006 年就由 Lynn 和 Vanhanen 合著出版了“IQ and Global Inequality”（參考十七），其中公佈了全球各地人民的平均智商，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並列榜首的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 108，臺灣和中國則並列第三之 105，相對於西方國家中最高的義大利為 102，挪威和英國的 100 及美國的 98。）

其實，觀之於散居於全世界各地（包括歐美和日本）的華僑們，更容易領悟出這個道理。長久以來，各地的華僑普遍的受當地人民與政府的歧視及打壓，連最先進和開放的美國加州，都曾明文立法禁止華裔購買房地產（參考七），由於是少數人種，在政治上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在經濟上，雖然是處於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卻都可以出人頭地，這怎麼可能是又愚又懶的民族或“醜陋的中國人”做得到的？當然印証華人是“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

另換一個角度而言，從進化論的觀點探討：優勝劣敗是生物進化的主要法則，靈長類的人類也是生物的一支，當然不會脫離此法則，那麼單就中國的人口繁殖成全世界最多的人種而言，即可證明它是最優秀的民族。此外，遠在二、三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立論已成傳世經典，又在西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如果是沒有最優秀的基因，中國怎可能培育出如此燦爛輝煌的文化和科技呢？再說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中華民族的確是有五千年燦爛輝煌的悠久歷史，人類史上數百萬年時間才培育出優秀的基因，怎可能在極短的兩百年內改變了呢？

## 醜陋的中國人

除了德高望重的胡適先生對中國人的評語外，臺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也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撰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參考八），其中強烈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這一切表象，都可以用“沒有禮貌、不講衛生及欠缺道德”而蓋括之，追根究底，這一切又都是經濟水平低落所導致及引伸的必然表象，和人種的優劣完全沒有關聯。

在任何經濟水平極度低落的社會，自然包括當年的中國，人類還不懂得利用資源而創造及累積財富，為求生存，人們不得不發揮不擇手段的動物本能，當然將仁義道德束之高閣。（小孩子快餓死了，偷餅充飢。沒能力養活自己的父親，應該對兒子說偷東西不好嗎？）其實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包括自私自利和不團結，都是智力較高的人或人種在貧窮環境中爭求生存的手段，相對於智力低者之逆來順受而遭淘汰，這是現在和過去所有經濟水平低落的社會之通病，絕非中國傳統文化醬缸所浸染出特有的劣根性，不過是展現於歷史上曾經高度輝煌過的中國，更顯得特別突出與諷刺而已。（號稱禮儀之邦的泱泱大國，居然培育出伸手向外國

乞討的學者，公開演講說“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禮貌和衛生又是教育（包括學校和家庭）的直接產物，在相當程度上道德亦然，在任何經濟水平低落，為求生存而需要博命的社會，那顧得上傳播或接受教育呢？

有錢能使鬼推磨和金錢萬能雖非正確觀念，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教育雖然極端重要，但在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都不可能排於首位，它雖非奢侈品，但也不可能餓著肚子去上學，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教育程度，無論是以入學年數或文盲多寡為標準，都和其經濟水平有完全對等的關聯（參考九）。回顧民初的中國，人均生產值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位居全世界的倒數第二，還不及非洲諸國，又一直在兵荒馬亂之中，那談得上教育呢？沒有禮貌、不講衛生及欠缺道德，完全是由於沒有接受學校和家庭教育的直接結果，實在是不足為奇。

然而文人和作家，為了生活而喧嘩取寵於讀者或聽眾，自孽式的倡言醜陋的中國人，原本無可厚非。但是柏楊先生居然在美國公開演講說“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以及在日本，欣然應答日本記者之題問“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站在我們日本土地上，對你自己的同胞，無情地指責和揭發，使我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請問你會不會感到羞愧？”令筆者不得不感嘆萬分，無以置評。

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帶動起科技和金融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和資金交流的趨勢，人類得以快速的創造及累積財富。華人憑借最優秀本質和最強的能力，而得以迅速的融入這股新興的浪潮，隨著財富的累積，社會才得以分配適當的資源致力於教育，通過這種良性循環，假以時日，中國人才能完全消除這近代數百年來浸染於醬缸的陋習惡行。但是教育是不可能立竿見影的，百年樹人雖有些誇張，但少說也得兩代。

## 文化大革命

要瞭解到近代國人的習性，無可避免必須深究“文化大革命”之影響，可能是筆者管見，這樁革命純粹是聰明絕頂的紅太陽，在單槍匹馬的情況下，可能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精心策劃出的奪權鬧劇。它翻天覆地的摧毀之歷史文物，對中國的損害還只是九牛一毛，更影響深遠的是，可能摧毀了中國固有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老百姓原本純樸善良的心和熱血黨員們對共產主義的憧憬，尤為甚者是，可能摧毀了所有人們判斷善惡是非的能力。是以，包括黨員的所有知識份子們，終生為了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到頭來可能是發現自己不過是被個人私欲所利用的工具，甚至還是摧毀中國固有文化和美德的間接幫兇，同時更身受過百般批鬥和凌辱，但僥倖而沒被虐待致死的劫後餘生者，怎可能不變成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者呢？而成千上萬前程光明的知識青年，原以為是為了建設新中國而上山下鄉十年，青年人所承受的皮肉之苦，雖有十年之久，還算不得什麼，而在精神上，他們可能是同樣地領悟自己只是工具和幫兇，更嚴重的是，面對的不是欣欣向榮光明的未來，卻是千瘡百孔看不見一絲曙光的未來。

改革開放之初，剛經過了長達十年“反教育”動亂的文化大革命之洗禮，整整一代人根本不知道經濟運作與商業行為何物，怎可能懂得為商之道呢？大家全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再加上私人企業全都是一無所有的空心大佬，國有企業的員工只知道大鍋飯，領導們都有文化大革命之後遺症。呈現於商場上自然是投機取巧、招搖撞騙、巧取豪奪和官商勾結等，無所不用其極的絕對自私自利之行為。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居然沒有沉淪而退化成弱肉強食的原始社會，反而在經濟上創造了奇蹟，這是全體國人偉大的成就。我們怎能忍心垢病那群非已之過而無緣接受教育的

市井小民的陋習惡行呢？

## 對普羅大眾之建言

筆者撰寫本文的對象之一是普羅大眾，目的是要告訴他們，中華民族的華人是世界上“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種族，主要的作用是，提高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個人要特別強調的是，本質乃所謂的基因或天性，國人的本質優秀是：先天的“平均智商不低”；再加上後天薰陶的“吃苦耐勞”。筆者堅信，“知識”是進步的泉源，“玉不琢、不成器”，優秀的本質，必須輔之以良好的教育；才更能充分的發揮。除此以外，筆者也確信：“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任何人都是不能夜郎自大地，以為本質好而不求上進的。

另外，所謂“本質”是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而非“現狀”，不能忘記的是，現代中國的人均生產值才只有 \$6,725；還不及香港或美國的五分之一，又以人均生產值為單位，中國僅為 \$3,292，還不及美國或日本的十分之一（參考十），所以中國人在目前並沒有沾沾自喜或夜郎自大的條件。不過基於中華民族的華人是世界上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認識，筆者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未來充滿信心。更重要的是，藉助本文激勵所有國人的意志，共同努力，朝向在 2026 年前後促使中國演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邁進；並在 2029 年達到中華民族成為全球經濟水平最高的人種（不太可能在 2029 年即達到，但觀之於香港和新加坡，這的確是絕對可以達到的目標），任重道遠，願與華人同胞共勉之！（參考六）

筆者相信以上“醜陋的中國人”一節中的分析，已經充分證明主張全盤西化論者的無知，西方先進的科技和金融創新，是近代經濟快速成長的原動力，是我們必須要學習和掌握的知識。但決不可崇洋媚外的將外國的垃圾文化，如嬉皮、吸毒、奢華、浪費等，也都照單全收的接受，中國人已經到了可以說“不”的時代。

我們更不可崇洋媚外的“盲目”崇拜外國的品牌，中國的工廠和勞工可以替世界頂級名牌代客加工出“中國製造”的優良精品，我們怎麼可能為“自我品牌”生產不出同樣的精品呢？我們更應該有選擇性的，盡可能的購買及使用國產品牌。

在過去由於整體經濟水平低落，“中國製造”當然等同“粗製濫造”，但近年來中國已經轉形為世界工廠，這個觀念早已落伍。在國外常居者應該是記憶猶新，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製造”也等同“粗製濫造”，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製造”卻演變成“品質保證”，歐美人士已經普遍認同日本製造出來的產品，品質幾乎一定比自家生產的要好得多。筆者確信今天許多中國製造出來的產品絕對足以媲美日本製造，因為全世界科技技術含量最高，同時也是最頂級品牌的蘋果手機，就是由富士康公司在中國工廠代工生產出來的，每一隻手機的背面都清楚的標注了“由加州的蘋果公司所設計，並由中國組裝而成”。

除了代表品質，“品牌”經常也是身價、身分、品味和格調的象徵，像擁有價值數千萬一輛的藍寶堅尼跑車，或十餘萬一隻的愛馬仕皮包，識貨者一眼而知其人身價。但在中國藍車的實用價值，還不如一輛價格不到百分之一的國產車，一來是毫無用武之地，因沒有無速度限制的超高速公路任其奔馳，再者，也擔心碰撞，而不方便任意行駛於鬧市。愛包的實用價值，也不過是一隻價格僅千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的山賽版手提包。在中國擁有藍車或愛包，只是展現出暴發戶或闊奶們的虛榮心與愚蠢，真正有品味和格調的人應該是會選用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我品牌”，充分的展現中國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對企業家之建言

企業家們是近代中國的經濟崛起最重要的一環，主要也是因為他們的帶動，中國才演進成世界工廠，當然是功不可沒。為富不仁和無商不奸乃淵源於原始或初級社會，當時人類還無法利用資源來創造財富，而社會之資源及財富有限，人們要想累積財富，必須得侵佔或掠奪其他人的財富，這正是 1913 年時中國的寫照。

隨著時代的進步，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帶動起科技和金融創新，以及國際貿易和資金交流的趨勢，人類得以快速的創造及累積財富，企業家們完全沒有必要，使用侵佔或掠奪他人的資源及財富的方式，來達到迅速累積財富的目的。

最好並有說服力的例子，應該是微軟公司的創辦人比爾蓋茨先生，通過創建微軟公司並銷售軟件而創造及累積財富，讓自己成為全球首富。最初合伙人保羅艾倫的財產相差不遠，身價也是美金數百億，公司所有員工的薪資和福利都特別優越；產品的中間商 - 硬體公司都得以增加本身硬體之銷售量；終端用戶都得以使用產品而增加自己的工作效率；甚至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工作效率，是以，所有和公司有關的對象，無論是股東到用戶，沒有不受惠者。而蓋茨先生現在更專注於慈善事業，正好是為富不仁和無商不奸的對照。這整個事件給我們的啟示應該是，比爾蓋茨先生的確為自己賺得了巨大的財富，但他所創造的財富卻遠遠地超過他個人所累積的，是以福澤社會。

現在的中國，正是新一代的企業家們發輝長才最理想的地方，因為中國既是世界工廠，又兼世界市場，再加上經濟的快速發展，乃全世界投資客都高度關注的地方。也因之變化迅速，競爭劇烈，企業家必須要與時俱進的能夠審時度勢、運籌帷幄，而高瞻遠矚、洞燭機先。

在過去利用廉價勞工代客加工，而賺取蠅頭小利的工廠，勢必將逐漸被淘汰。最近五年中國的城市人均工資從 2003 年的人民幣 13,969 元，跳長到 2008 年的 28,898 元，相當於頗為驚人的年增長率 15.65%（參考十一），這個趨勢一定會長期的持續下去，不可能逆轉，筆者在“論中國經濟崛起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參考六）的文章中已經做了詳細分析與探討。

各個企業應對之道，當然是各顯神通，不過大致應該不外乎以下三類：下策是加強管理，提高企業運作效益，以抵消勞工成本之增加，前述鴻海集團之管理績效顯然是已達爐火純青，才得以大幅度給員工加薪近七成，而從容化解旗下之富士康公司員工跳樓事件，不過這也是所有企業本來就應該做的份內之事。中策是提高產品之技術含量或變更產品（參考十二）。上策乃順應中國演進成世界市場之潮流，整個提升或改變企業之營運方針，由“中國製造”蛻變為“中國創造”及營建“自我品牌”，大家耳熟能詳的旺旺品牌和公司，當然是最好的例子。隨著中國經濟之快速成長，而水漲船高，怎麼會有工資增長的壓力？

中國以高效率的工廠贏得“世界工廠”或“世界製造業之大本營”的美譽，其實到 2008 年為止，中國製造業之年生產總值為 1990 US\$1.12 兆，還遠落後於美國之 \$1.73 兆（參考十三），這主要是因為生產的大多是一般技術含量不高而單位價格低廉的日用產品或代客加工，免不了由於競爭劇烈而利潤微薄，所賺取的當然只是辛苦的血汗錢，相對於美國仍然掌握著技術含量較高而單位價格高昂的多數工業產品的生產。最好的例子應該還是鴻海集團，其管理績效雖已達爐火純青，而利潤也不過是區區百分之幾的蠅頭小利，筆者甚為敬佩其營運管理績效與快速發展之企圖心，但卻不得不惋惜其領導團隊之有勇無謀，全神貫注於上述之下策而未能深思熟慮和審時度勢的朝於上策和中策邁步。不過早在 1997 年，鴻海集團也曾經籌劃在南加州建立一個研究中心，非常可惜的是，這個計劃未能付諸實現。否則作為最新高科

技創新代表的蘋果手機，或許可能該是鴻海手機，其背面將標注的是“由加州的富士康公司所設計，並由中國組裝而成”。那麼，鴻海的利潤將不是區區的百分之幾的代工費，最起碼也會提高數倍。退而求其次，筆者確信鴻海集團或其他大型的中國製造業都足以勝任變更產品而生產入門關坎較高但競爭有限的工業產品，同樣也會提高利潤數倍。

早在六七十年代，美國的航太工業展開了登陸月球計劃，當年就有大批華裔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參與，又都是其中之佼佼者。多年來華裔的高科技從業者，一直在美國工業和教育界占舉足輕重的地位，今天，華裔的朱棣文博士更受聘為美國能源部長，充分證明華人在科技方面超卓之能力。

中國人要有自信心，中國企業更應該要有充分的自信心，中國企業應該要超越代客加工時代，而步入“中國創造”及營建“自我品牌”的時代。科技和創新都是國人強項，多年來美國還代為培訓了大批人才，中國企業應該要善加利用，相對而言，銷售和金融人才略為不足，然而，現在已經是國際普遍交流的世界，有錢能使鬼推磨，重金之下，豈能禮聘不到人才。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曾經是以投機倒把和官商勾結為長的草莽英雄們賺得第一桶金的天堂。但隨著經濟快速而穩定的成長，中國的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潮接軌，那些不能接受及溶入現代經濟運作規律的企業，已經或必然被淘汰。現代企業追求的目標仍然是生存、發展和盈利，但過程中著重的是效率、品質、服務、信譽、創新，而絕不是投機取巧。中國正朝著“世界工廠”、“世界市場”和“世界中心”的康莊大道上，穩健的邁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的溶入西方工業和經濟發展的浪潮，要想以數十年的時間追及西方數百年累積之成果，雖有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國人為後盾，但也必須靈活的運用各種捷徑，尤其是現代西方企業界追求快速發展必須掌握和依賴的併購（Merger & Acquisition）。舉世聞名的“股神”巴菲特，其實更精通及賴以維生就是併購，他所掌控的柏克夏控股公司完全都是由他所併購的戰利品組成；科技大佬思科公司歷年來一直保持領先群倫，也是在於先後併購了過百的中小公司；以員工素質超凡及創新聞名的谷歌公司，也不例外的不斷進行併購。這主要是因為與內部擴充相比，併購可使企業更快地適應環境變化，有效降低進入新產業和新市場的壁壘，並且令風險相對減少非常多，是所謂“花錢買時間”，更重要是購買技術與市場佔有率，乃現代企業必須掌握的利器。

然而不少中國企業家對於這項必須掌握的利器，視之為畏途，的確是，跨國併購的成功率較低，導致失敗的主因之一是，併購者對併購對象所在地之國情和文化的瞭解有限，而善加利用遍及全球的華裔專才或就地取才可避免之。又國人之通病乃貪圖便宜，西門子集團公司並非慈善機構，要出讓其手機部門，不但免費贈送，還陪伴以豐厚的嫁妝，臺灣的明基集團居然天真的以為，在如戰場的國際商場上，也會撿到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以這種心態從事併購怎可能成功？是以，明基之收購西門子可說是可笑又沈痛，平白損失 \$6 億歐元卻惹得一身騷的鬧劇。

併購是一門學問（參考十四），更是中國的經濟要迎頭趕上歐美必須要掌握的利器，事實上企業家們如果能對國內的經濟有充分的瞭解，並對歐美的各類各行企業有足夠的認識，尤其是在製造業能夠掌握產品的生產成本分析，是所謂知己知彼，則不難發現有許多併購的機會，可以截長補短的利用到雙方兩地的長處，而達到風險既低但利潤卻超常，同時更達到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的。

## 對政府之建言

改革開放之後，政府的領導階層們雖然大多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的確是提供給世界上本質最優秀和能力最強的國人們，一個能充分發揮的環境和機會。（包括在軍事上已經發展成一流強國，讓中國免於戰亂的干擾。）在近代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又一直兢兢業業的以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快速成長，也是功不可沒。

教育是消除國人陋習惡行的惟一途徑，同樣也是培育下一代謀生能力的惟一途徑，也就是整個社會和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其重要性是絕對無法過分強調的。然而在 1999 年中國政府的教育預算只占總預算之 13%，是 146 個國家中之第 86 位；又占總生產值之 1.9%，是 158 個國家中之第 151 位，真的是慘不忍睹的不足（參考九）。筆者衷心希望這不是一組正確的數據，但相信及冀望現在中國政府的領導階層，不再那樣地忽視教育。

傳統的教育場所是家庭和學校，媒介乃言傳和書籍，隨著時代的進步，電視、音樂和互聯網所發揮的影響和作用，顯然要比傳統的媒介更大許多。中國政府的教育部，好像還沒有專職機構，負責利用這些近代媒介來傳播各級和各類教育，筆者相信，用之於這方面的經費，其效益將遠超過各級學校，非常值得中國政府大幅度的增加這方面的預算和經費。

普羅大眾應有自信心，中國政府同樣應有自信心，在政治上容忍反對的言論，可能也是疏導壓力的安全閥，但政治非筆者之長，就此打住。在經濟金融方面，政府對外匯管制趨向於大多發展中國家之形態而較嚴，但匯率偏低，好處是利於出口，但壞處是減低了生產值。筆者認為管制較嚴，扭曲了正常之經濟運作，可能是弊大於利（參考十四），雖然中國人已經到了可以說“不”的時代，不必接受外國人的干擾，但站在本身的立場還是值得從長計議。又中國市場已漸趨成形為自給自足，可能鼓勵內需尤勝於出口。但匯率之調整，必須控制其幅度及速度，切忌放任，盡量避免熱錢之操縱投機。

近年來靠國人血汗而累積的兩兆餘外匯存底，投資於美國國債，支撐其經濟，實在不是好的選擇。其實更應該用於鼓勵與協助企業界，朝製造技術含量較高工業產品以及發展“中國創造”及營建“自我品牌”的方向蛻變，也就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那才是一本萬利的理想投資呢。又為了提高可能得到的報酬率，利用部分外匯存底而成立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在商言商的投資於美國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目前的結果雖然和預期完全相反，卻也無可厚非，因為高報酬率原本就離不開高風險，但是筆者建議，更好的選擇絕對是投資於中國的風險基金，因為這原本就是順應世界投資業的趨勢，美國的經濟已趨成熟，投資機會和報酬率都有限，而中國的經濟正欣欣向榮，投資機會多及報酬率高，是世界投資客都趨之若鶩的理想所在，再者，更是理所當然，政府本來就應該大力投入的對象。

中國政府所制定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已明文列出將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並指出要以自主創新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和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這充分的證明政府的領導階層們審時度勢和高瞻遠矚的灼見睿智。但是在執行的力道上，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是遠、遠、遠地不足。

為了配合十一五規劃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務院和上海市國有資產管理局主導而成立了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推展開發 ARJ21 翔鳳客機之計劃，這絕對是值得稱許的開端，但院市兩單位總共投資不過 110 億元人民幣，只相當於 \$16 億美金，還少於中國投資在黑石集團的投資，到目前所虧損的金額，相對於西歐四國先後投資於空中巴士集團的 \$400 億，更是相形見絀，足以證明領導階層們對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航空工業的重要性之瞭解還完全不到位。

改革開放之後從 1976 到 2008 年，中國國內年生產總值由 1990 US\$0.12 兆提升到 \$2.37 兆，增加了 19 倍，而製造業則由 \$0.0355 兆提升到 \$1.12 兆，增加了 30 餘倍，同期製造業所占生產總值的比率由 30% 提升到 47%，由此可見製造業對中國整體經濟的重要性，更証明了**製造業是帶動中國經濟快速提升的原動力，更重要的是航空工業乃所有製造業的龍頭老大，應該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標竿**，然而各級政府只肯在航空工業投入象徵性的區區 \$16 億，還不到國家外匯存底的千分之一，是以筆者認為這是遠、遠、遠地不足。

筆者相信，許多政府的領導階層們對航空製造工業認識有限，即便是國內的航空工業專家們，對西方的經濟和企業運作也同樣是瞭解有限，因此而有嚴重的誤解，認為航空工業是一項不賺錢的行業，**其實在特定的條件下，在中國投資於航空工業的許多項目，會是利潤極高而風險卻低，同時也將是立竿見影在短時間內即可看到成效的投資**，但航空工業之入行門檻極高，尤其是初期投資金額龐大，非一般企業所能負擔是以筆者建議，政府利用 \$200 億美金（不到 1%）的外匯存底，建立航空工業開發基金，主要的目的是配合大型飛機的工作，利用充沛的資金快速的掌握各個領域中先進技術。這筆資金主要是做為優惠貸款提供給創投業、私募業和企業界，用以併購擁有先進航空工業技術以及“市場”的歐美廠商。部分則用為系統化的培植其他無法通過直接併購而得到的核心技術。由於這筆資金完全是投資於發展對中國而言最賺錢的行業，最終應該是一本萬利的。**同樣地，另有幾種類似的製造技術含量較高之工業產品，也絕對值得政府建立開發基金，提供給企業界用以併購擁有先進技術和市場的歐美廠商**。筆者確信，此舉更將為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添加助推器。

十一五規劃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社會和諧，足見領導階層們的灼見睿智，體諒由經濟快速成長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化和城鄉差距，致力於消除因之而產生的乖戾之氣和社會穩定，是為中國長期發展奠定基礎，是絕對正確的思維。然而在執行上，著重的應該是盡可能的提升貧鄉，而非打壓富城，因此而求減低經濟成長速度，是因噎廢食，非明智之舉。又近年來政府一直運作宏觀調控以避免經濟過熱，其主要目的並非減低經濟成長速度，而是防止隨之“可能”引起的通貨膨脹之惡果。**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既可加速經濟之增長，更能疏解通脹的壓力，因為轉形生產單位價格高昂的工業產品，必然減少對原材料的使用與需求，再加上也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正是一舉多得美事**。政府的領導階層不可能忽視今天中國的人均生產值還不及美國或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以在不引起的通脹的情況下持續加速經濟之增長，仍該是政府著重的方針**，又產業結構優化以後，企業之營運利潤將大幅度提高，政府可增加稅收而多多貼補貧鄉，儘量彌補與富城的差距，如直接資助致力於貧鄉教育的“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參考十五），那才是最好的促進社會和諧之途徑。

近乎泛濫，充斥市場的山賽版和假貨，是中國企業建立“自我品牌”的最大障礙，毒奶粉事件的殺傷力，遠遠不至於直接受害兒童們的健康，和三鹿公司的破產，它幾乎摧毀了世人對所有國產商品的信心。彌補受害者的損失和懲處肇事者，只是亡羊補牢之最起碼的步驟，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有系統的建立一套完整地對所有商品都做鑑定和審查的機制，重新建立世人對國產商品的信心，促進中國企業步入“中國創造”及營建“自我品牌”的時代。

“據商務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逃貪官數量約為 4000 人，攜走資金約 500 億美元。這樣算來，人均卷走近 1 億元人民幣。”這廣為流傳而未經証實的消息（參考十六），應該不是純粹的空穴來風，4000 人和 \$500 億是有名有姓的外逃資金，無名無姓的未逃資金和各種眉目的灰色收入，豈會少於百倍、千倍？又深入的探討，貪官的外逃資金不同於企業往來運作之資金，絕大部分應該是來自於接受的賄賂。而行賄者如果沒有兩倍以上的直接好處，怎可能去犯法行賄？而涉及項目的直接或間接損失，當然又會放大數倍。更嚴重和惡劣的影響，在於打擊了其他不收賄者的士氣。最佳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效法新加坡之高薪養廉。用

一個玩笑的例子來闡述：政府如果給這批貪官每人1億元的薪酬，重酬之下，這批官員絕對不會也不敢再多貪賄賂。一來避免了行賄者的直接圖利，再者涉及項目更會節省了放大數倍直接或間接損失。附加的好處是，這1億元的薪酬也沒必要流失到國外，反而助長經濟繁榮。更重要的則是，必將大幅度提升所有政府官員們的士氣，連普遍浪費公孛的惡習，也可能自動糾正過來。這個方案是值得仔細的撥算盤，慎重考慮的。

張 銘 琛

注：文中對德高望重的胡適和柏場先生的評語，似乎過於刻薄有欠厚道，而且基本上我對他們兩位還是敬佩的，是以有些感到過意不去。但是看到他們那幾段對華人公開的評語，卻無法忍氣吞聲，反正已經是一把老骨頭，無求於人，也不在意別人的批評或指責，才不吐不快的寫出來。

(歡迎及希望本文讀者的批評及指正。如有需要，筆者將提供完整的參考資料與資料。)

張銘琛 [ming99chang@gmail.com](mailto:ming99chang@gmail.com)